

中 华 精 神

环球凉热

—— 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历程

乔治忠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 华 精 神

环 球 凉 热

—— 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历程

乔治忠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环球凉热

——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历程

乔治忠 著

责任编辑 夏晓远 鲁锦寰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3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7-215-04085-2/K · 597 定价:9.50 元

《中华精神》丛书序

02/16/20
所

谓“精神”与“规律”，都是对现象界的归纳与抽象。不同的是，前者较依赖于直觉，而后者更依赖于理性；前者显得模糊，后者则较为清晰（不论其与客观实际是否冥合）。甚至按照西方某些哲人的看法，对于精神与规律的认知，构成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分野。倘若人们急于想用“规律”来取代“精神”，结果只能随着过于自信的黑格尔走进必然的“日耳曼王国”时期，在此一切都臻于至善，思维则仅供写作教堂颂诗。

如此说来，“中华精神”是什么？自然也不是个“一言以蔽之”的问题。长于抽象思维的哲学家或文化学者对此已经有了各式各样的概括，诸如天人合一，日日新又日新，自强不息，生生不已，宽容，中庸，和平，尚文好礼，人文精神等等；又如保

守好古，墨守成规，逆来顺受，乡愿气，阿 Q 精神，酱缸精神，窝里斗等等。这些无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而，虔诚的读者在如此不容置疑而又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之间穿行之后，不仅对中华精神依旧茫然，而且疲乏之余，疑窦大生。看来，偏执某种预先设定的价值标准去认知中华精神，适足以成就一种假说，而牺牲的却可能是全豹。

睿智圣哲如老子，对其哲学体系中最核心的范畴——道，尚且难以名状，欲说还休，原因是他体悟到“道可道，非常道”，更何况偌大的中华精神呢？

在一个历史学者看来，所谓中华精神只能隐显出没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它应远比多瑙河之蓝与黄河之黄有着更奇诡斑斓的色调，它活生生地体现在政治家们的雄才大略与机巧谋诈之中，体现在思想家们殚精竭虑的逼问与应答之中，体现在军旅生涯的运筹决胜、马革裹尸之间，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匠心与慧光之中，体现在野田禾稻、千里赤地与漫漫商道之中……总之，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数百亿苍生的难以数计的风流人物，用他们的希冀与幻灭，用他们的奋斗与彷徨，用他们的欢乐与苦痛，用他们的脊梁与手足，共同支撑起这样一种精神，我们无以名之，姑谓之“中华精神”。有了它，我们的文明才得以薪尽火传；有了它，中国才所以为中国。

于是，这七本小书的目的无非是期望通过对中华历史的回眸一顾，来求得一种呈现。或许这种呈现依然不那么可辨可识，可触可摸，但若能给读者诸君以大漠孤烟或长河落日般的瞬间的映象，

或能牵引出更为悠长的思绪,我与诸位作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是为序。

刘泽华

于南开园再思斋

1995年9月

目录

《中华精神》丛书序	刘泽华 (1)
从张骞到甘英	
——汉人远行的足迹	(1)
推表山川, 考采境壤	
——唐僧西游取经和考察	(8)
宣德化于海外	
——郑和下“西洋”	(15)
天外之区的审求	
——中国“正史”中的外国视野	(23)
平民所见的海外世界	
——谢清高与《海录》	(32)
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海国图志》的前前后后	(40)
远游西极, 发壮丽之大观	
——林针和《西海纪游草》	(48)

采风至列邦,见闻广图史

——试椿游历欧洲及其观感 (56)

“可以深长思”的出使

——志刚欧美之行及其记载 (64)

述奇中的国外新信息

——张德彝对环游欧美的记述 (70)

借法自强和中体西用

——洋务派对西方世界的认识 (78)

环游地球增长的见识

——李圭及其旅行记录 (85)

曾经沧海,遍览西学

——王韬眼中的世界 (92)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

——容闳及其《西学东渐记》 (101)

一位外交官员对世界的观察

——黎庶昌的《西洋杂志》 (108)

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

——郭嵩焘考见的西方文明 (115)

西方富强之源的探求

——薛福成出洋考察的心得 (124)

西方社会学说的引进

——严复的译书活动及其思想 (132)

千秋鉴借《吾妻镜》

——黄遵宪对日本的认识 (140)

世界开新逢进化

——康有为认识西方的视角 (148)

世纪开新幕,风潮集远洋

——梁启超游历外国的感受…………… (157)

世界风云对中国的启示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观念…………… (166)

从张骞到甘英

——汉人远行的足迹

公元前 139 年,即距今二千一百三十余年之前,中国正处于西汉王朝的强盛时期。颇具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出了一个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向西进发,意欲穿过匈奴控制的地区而联络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月氏等国,以构成对匈奴前后夹击的战略形势,从而彻底解决匈奴久为边患的问题。这个使团的首席使臣,就是名垂青史的张骞,张骞出使西域各国,是古代中国一次破天荒的壮举。

早自四五千年前,黄河流域已成为中华民族最早迈入阶级社会和文明时代的发祥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宜人,适于发展农业,以传说中的黄帝部族和炎帝部族在这里共同构成了华夏族的主干,并且在不断融和其他部族的过程中,逐步拓展着活动的疆域。因此,黄河中下游地

区乃是中华民族文明兴起的中心，古代所谓“中原”、“中国”即指这一地区。

然而，所谓“中国”并非像古人想象的那样处于天下之正中，实际上是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向东发展被限制于烟波浩瀚的大海，而西部则是辽阔的山岭、高原或沙漠，人烟稀少，气候干燥，同样是人类活动的天然障碍。不仅如此，西部、北部的一些游牧民族，也将中原作为侵扰和抢掠的对象，秦汉时期，匈奴是内地中国封建王朝所要抵御的头号入侵势力。为此，秦始皇修筑举世闻名的长城，而汉武帝则决心向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反击。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汉武帝从降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匈奴曾攻杀月氏国王，而且把月氏王的头骨当作饮器，月氏乃是匈奴的仇敌。于是汉武帝决计通使月氏，共击匈奴。但通使月氏，必须经过匈奴所占之地，所以采取招募的办法任用自愿前往的智勇之士为使臣，职位低微的郎官张骞出而应募，得到了重用。

张骞率领使团从陇西（今甘肃省西部）离开汉朝疆界，他们并不确知月氏国所在的方位和距离，走在完全生疏的广袤高原之上，其行程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更严重的是，使团必须穿过匈奴占领地区，要时时躲避匈奴人的查觉和匈奴兵马的截击。而不幸的是，张骞的使团终究没有突破匈奴的警戒，成了匈奴的俘虏。张骞被扣留在匈奴，被迫娶匈奴女为妻，过着类若软禁的生活，而十余年间，他始终不忘为汉朝出使月氏的重任，珍藏汉武帝授予他的节旄。节旄是汉代皇帝授予使臣的信物，由八尺长的竹竿饰以牦牛尾制成，象征着使臣的身份和使命，不丢失和不遗弃节旄，也就体现了不忘自身使命、不失自身志节的精神。

随着岁月的流逝，匈奴对张骞等人的监视也有所放松，时时谋

求脱逃的张骞终于得到了机会，带领少数属员继续向西行进，经过十几天的奔波，抵达大宛国。在大宛国派人护送下到达康居，又从康居到达了大月氏。此时月氏人已经躲避匈奴西行，征服了大夏国而居于其地，过上了安定富庶的生活，不想再与匈奴交战。张骞出使的政治军事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在大月氏等国留居一年多，考察和了解了许多国家的风土、方位、交通、人口、物产及政治、历史状况，回国后尽数汇报给朝廷，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大开了中国人认识域外世界的眼界。

张骞亲身考察和从传闻中了解了哪些国家呢？

第一是大宛，位于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边界地带。汉朝时大宛农牧业已很发达，盛产葡萄、苜蓿，有被称为“汗血马”的好马。大小属邑共七十余城，人口约几十万。

第二是乌孙，是一个不定居的游牧民族。西迁至今新疆伊犁地区，与匈奴同俗，原附庸于匈奴，后国力强盛而独立。位于大宛东北。

第三是康居，位于大宛西北，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国小，受制于匈奴和月氏。

第四是奄蔡，位于康居西北，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咸海至里海之间，与康居同俗。

第五是大月氏，在大宛之西，康居之南，即今流过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地带的阿姆河上游地区。原生活于中国境内敦煌和祁连山之间，为游牧民族，被匈奴击败，乃西迁远去，征服大夏而居于阿姆河以北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

第六为安息，在大月氏之西，种植稻麦，城邑如大宛，地方数千里，为当时大国，商业发达，舟车通各国，以银铸钱，钱上有国王像，

文字横行书写于皮革。即波斯，今伊朗。

第七为条枝，又在安息之西，为安息属国，气候温热。国有魔术师，农耕种稻，人口众多，当为今伊拉克、叙利亚地区。

第八为大夏，在大宛西南，阿姆河之南，即今阿富汗北部。与大宛同俗，然兵弱畏战，被大月氏所征服。张骞还在大夏听到关于身毒国（即印度）的情况，推算了身毒的方位，认为从中国蜀地（今四川）向西南可以抵达，促使汉武帝重新计划经营“西南夷”以求通于身毒和大夏。

以上所列张骞考察过的国家和地区，除乌孙未出今中国新疆境界外，其他均为中亚、西亚的古国，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张骞被匈奴软禁十余年而不忘使命，历访西域各国后，在返国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仍乘其内乱逃回，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考察外国的创举，表现了矢志不移的顽强意志和勇于探索的进取精神。张骞出使时率一百多人的使团，回国时只剩下他与堂邑父二人，由此可以想见其行程经历是何等艰险！但张骞对这些艰难险阻没有丝毫的畏惧心理，也不因为第一次出使的功成名就而稍思隐退，却建议汉武帝从西南方向打通联络身毒和大夏各国的道路。于是，汉武帝令张骞以蜀犍为（今四川宜宾附近）作基地，率使团分四路探查通往大夏的道路。张骞的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开通第二条联络外国的途径的目的，但却考察和了解了当时云南许多民族的状况，为汉朝开拓和经营西南地区之嚆矢。

几年之后，张骞又自告奋勇地要求出使乌孙，试图动员乌孙东迁，臣属于汉，并进而招来大夏等国为外臣，以扩大汉朝的势力范围和影响。于是，经汉武帝旨准，张骞开始了第三次出使。这次出使规模宏大，组成了三百人的使团，携带大量牛羊、钱财和丝织品，

并且多设副使，皆各持节旄，以便分头联络各国。此时，汉朝已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重大胜利，驱逐其于遥远的漠北之地，出使的通道基本控制在汉朝军队手中。张骞到达乌孙，恰逢乌孙国王年老，众子争位，国势不稳，大臣多不愿移徙。但乌孙国仍对张骞一行汉使十分友好，张骞分派各副使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扞采等各国联络，而以乌孙为基地。回国时，乌孙派使者数人随张骞回访汉朝，中国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据史书记载，张骞身强力壮，为人宽厚，极讲信用，受到各族、各国人的爱戴和尊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也是出色的外交家。他曾因功封为博望侯，第三次出使后位列九卿，一年后逝世。在张骞开辟了西域通道之后，西汉派往的使者络绎不绝，由于张骞在各国的威望，使者皆自称按博望侯意旨而来，外国由此而加以信任，张骞的名号已成为当时中外交流的一面旗帜。

自张骞开通西域之后，中国兴起了一个出使外国的热潮，原先随从张骞出使过的吏卒纷纷上书求为使节。汉武帝恃其国力雄厚，予以鼓励，广募吏民作为随从人员，频繁派出。使者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形成“使者相望于道”的繁盛局面。这些人莠莠不齐，其中颇有侵渔财物者，汉武帝每每审查并判以重罪，却令其再出使而立功自赎。于是，使端无穷，出使的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可谓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第一次的“官派出国热”。

出使外国的热潮，虽然酿成了一些争端和汉朝对外的几次战争，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各国的相互了解则居于主导地位，汉朝引进了葡萄、苜蓿的种植，输入了大宛的好马；西域各国得到了中国的丝织品、漆器，学会了中国铸造兵器和器具的技术，犁靽（罗马帝国）的魔术师也陆续来到中国。从此，中国通往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路线形成并得以巩固，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一条主要国际商贸通

道。这里商道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伊朗，抵达伊拉克和叙利亚，全长七千多公里。从叙利亚在地中海的港口，可以通往埃及和欧洲。在这横跨欧亚的通道上，商队来去、使团往还，各国各民族互通有无，互相学习生产技术，互相汲取文化精华，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发展。由于中国的丝绸是当时国际贸易最享盛名的物品，这条通道被美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为汉代中国人勇于探索世界和认识世界的精神竖立一个永久的历史丰碑。

为了保护这条通道的畅行，汉武帝徙徙士卒在今新疆轮台一带屯田，并从敦煌至罗布泊之间设立驿站。至汉宣帝时，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建立西域都护府，统领和管辖当地诸国事宜。东汉时，班超为西域都护，于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派甘英出使大秦国，大秦即位于今意大利的罗马帝国。甘英抵达条枝，欲度大海（应为地中海），而“安息西界船人”告诉甘英：“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因之打消了度海至欧洲的计划。其实这位“船人”当是当地商人，他故意夸大度海的艰险，以欺骗手段阻止了甘英的行程。因为安息商人从转手中国对罗马的丝绸贸易中获利极大，千方百计阻挡欧洲人与中国的直接通商。甘英虽然没有到达欧洲，但中国对欧洲的了解却通过各种途径日益加深，如《后汉书》对大秦国的描述十分生动具体，称其宫室“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实则是柱上镶有玻璃，并用玻璃做食器，这与罗马帝国的情况是十分切合的。

从张骞到甘英，中国人的足迹踏遍了中亚和西亚各国，也抵达了南亚印度等地，显示了富于探索整个世界、认识整个世界的豪迈

气概。这种出使远行,最初带有直接的政治军事目的,并以强盛的国力为后盾,最高统治者也不免怀有攫取各国珍奇异物和炫耀国家强大富有的动机。但这种远行探索成果的保持、巩固和发展,则必须立足于经济、文化的内外交流,丝绸之路的长期存在,即已证明了这点。而历史的发展前进,也必然会打破地理上或人为上的障碍,不断地扩大认识世界的广度,加强与更多、更远地区与国家的交流和联系。而在中国人不断放开眼界,认识世界的历程中,张骞是一位最早将亲身考察范围扩大到今中国境外的开拓者。他以自己成功的活动,激发了中国人不断地探查未知地域的进取精神。每一朝代,在其国力允许的情况下,无不试图比前代在地理范围上了解得更远、控制或影响得更远。自张骞的事迹和他所了解的域外知识被笔之于史册,历代皆以记述域外各国的地理、风情、人物及与中土的交往作为一代之史的重要内容,记述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记载域外的地理、人文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即认识本国与认识世界溶合为一体,这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而这种传统精神的形成,与汉代众多勤于远略先行者的业绩是分不开的。因此,汉人远行的足迹,无疑是踏开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不断延伸、不断拓展的路径。

推表山川,考采境壤

——唐僧西游取经和考察

唐朝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新春伊始,大地复苏,在首都长安城外,由皇帝唐太宗亲自下令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百姓也都出城观看,长安几乎为之一空。被欢迎者何人?既不是外出巡按的高官显贵,也不是征战凯旋的三军统帅,而只是一位远行取经归来的和尚。从此,他的法名——玄奘垂于青史,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和两国友谊的象征,而所谓“唐僧取经”的故事则成为千古美谈。

玄奘(602年~664年)俗姓陈,名祿,原为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附近)人。早年即出家为僧,潜心研究佛教经典,成为一个有名的佛学家。

佛教至迟在东汉初年已传入中国内地,至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影响遍及全国。但同时也形